# 新清华的一代人

侯宇燕

我想谈谈一位已不在人世的清华老师王震寰。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记得他呢？也许，以他的性情，也不需要为人所念。我惟有悄悄在心中回忆那些过去的图景，虽然这回忆也“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1987年的初春，因病休学的我，有幸于每周末下午，随母亲去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那有着圆形大穹顶的阶梯教室，听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组织的教工音乐欣赏课。惊鸿一瞥，从此这些旋律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审美情趣。

“中国民乐”的讲解者就是清华音乐教研室的王震寰老师。现在我仍保留着那时的讲义。顺便提一句，1993年，坊间轰轰烈烈评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我无意中于报纸刊出的作者名单中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

王老师刻印的讲义，从诗经始，到楚辞、梅花三弄、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直至各地域各时代的民歌小调，甚至当时刚刚播映的《红楼梦》插曲都有。词、谱一应俱全，连相应的文学背景资料也配备详细，厚厚的一大摞，字迹整齐划一，清晰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王老师还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如有兴趣，还可去音乐教研室录这些音乐的磁带，一元钱一盘，共三盘。因为无论乐曲还是民歌，其演奏者、演唱者都是最出色的“大腕”。譬如有刘德海演奏的《十面埋伏》，闵惠芬演奏的《二泉映月》，施鸿鄂演唱的《满江红》，佟铁鑫演唱的《对面山上的姑娘》，当然也有延安时期那些旋律优美的新歌剧……在80年代后期，港台歌曲已大行其道，这些“老”而“土”的乐曲的命运似乎不大美妙。总之，若无王老师这个渠道，当时的我绝对无缘得入宝山，甚而有幸听到这些最权威的版本。

多少年来，我不知听过多少遍这三盘卡带，可谓浸淫甚深。那旋律早已深入我的心灵，与我融为一体。我在这些乐曲上寄予了无数道德与文化意义的审美想象。“祖国”的形象就这样出来了。

短短半学期的讲座结束后，人们各复其位。秋天，我从别人偶然的交谈中惊悉王老师已患喉癌病逝。他去得悄无声息，未泛起几丝涟漪。原来就在最后一堂课乃至更早的时候，王老师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快速走向生命与事业的尽头。最初的震惊缓缓消失后，我心中涌起的情感，是强烈的怜惜多于伤悲。这听来有点可笑。一个刚过十四岁的孩子怜惜一位已逝的中年知识分子。但这是无比真实的情感。王老师那瘦弱的身影，沾满粉笔灰的衣衫，厚厚镜片后欣喜的眼神和淡淡的悲哀，潜伏着致命病灶的嘶哑的嗓子，还有用大字工工整整写成的讲稿……就像我从小就常常涌起在心间的，对骑着破自行车穿梭于实验室、幼儿园、小学、家门之间，匆匆而过的父辈们的强烈的怜惜。他们有瘦削的脸庞，常常纷乱的头发，羸弱的肩膀，永远不能停息的生活之轮……

说到王老师，就不能回避新清华。王老师经历过老清华的尾声，有深厚的西洋音乐功底，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也真心热爱着鼓舞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解放区新歌剧……这些年来，人们对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新清华人的研究探讨远没有对老清华多，但实际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把“士”的特征发挥到极致的克己奉公的一代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乳汁灌溉了祖国、事业、子女，却唯独没有营养他们自己早衰的身体。也许，只能将这些缺憾划归为时代的悲剧。新清华一度由综合性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程师摇篮，单一的训练难免形成匠气，这是公认的遗憾。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封闭剧变的社会环境……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这代人没有留下鲜明的历史性形象。但不能否认，这段岁月培养出来的清华人在坎坷中充满了奉献的血汗、信仰的激情。纵然是仆倒在地，一颗心依然高举对祖国的热恋。

在今天的清华园，依然时常可见“王老师”的身影。他们衣着普通，两鬓斑白。尽管子女已事业有成，他们依然骑着自行车，四处奉献余热。他们太过平凡，却又有引人注目的共性。无论男女，都刚毅、持守、执拗，甚至多少有点不合时宜。老式镜片后深邃眼神闪烁的是关心政治的热情，参与社会生活的赤子之心，以及孩子气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这标志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眼神，比校庆时别在他们衣襟上的红纸条更能证明那一代人的身份。

这一份沉甸甸的爱国爱事业之情，在清华是一代代传递的。国庆70周年时，宿舍阳台上都招展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是“我和我的祖国”的红色字样。老清华和新清华融合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这里永远传承下去。

# 我与“夜报”的故事

沈开达

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1月1日的傍晚，我和邻居大哥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看着投递员走进弄堂，挨家挨户投送着《新民晚报》，邻居大哥随口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夜报夜报，新民夜（晚）报。”那时我觉得很好奇，因为从我记事起，报纸都是上午投送的。从那一天起，我开启了阅读晚报的时光……

其实，我知道《新民晚报》这张报纸要早于它复刊的日子。读幼儿园时，父亲让我学书法，练“柳公权体”。家里的一本《玄秘塔碑》已经破旧了，大人用旧报纸加糨糊给重新粘结了一下。不过，因为“年久失修”，粘结处有点脱开。于是，我在练帖的过程中，好奇加调皮地把中间破损的地方再拉拉开，索性把整页给扯开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了点啥？不看不要紧，一看就上瘾。原来，那里面当“衬里”的就是“文革”前的《新民晚报》，其中有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连载，有“灯花”“随笔”或评论性文章，还有一些广告等，这在“十年动乱”期间的报纸上是见不到的。

看着这已经泛黄而且是残破的“老”晚报，我发觉比当年的大报纸要好看多了。文章内容丰富，不说大话空话，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为此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探究一番。有一次，我大着胆子问爸爸：“这就是你们说过的《新民晚报》啊？蛮好看的呀，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老爸支支吾吾的，不愿接这个话题。一看苗头不对，我也就不追问了，但这个疑问一直留存在心里。

“文革”结束，中华大地迎来了春天。文化出版领域开始拨乱反正，许多报纸、刊物陆续复刊，《新民晚报》也获得了新生。上海市民等来了好消息：夜报要复刊了！一张《新民晚报》订阅单成了市面上的抢手货。老妈通过朋友的关系终于弄到了一张，那天她下班回家，兴奋地拿出了这张订阅单，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爸爸最开心，他自言自语道：“又可以看夜报啦！”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看《新民晚报》成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功课”。当时的晚报还是六版，一人在手，旁边的人都急不可耐地催促着：看好了没有？听说有的人家干脆把报纸一撕为二，以此平息“纷争”。那时我上高一，爸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新民晚报》的“夜光杯”非常好，里面的文章你要好好看，对你写作文大有帮助啊！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读者·作者·编者

时间到了2014年，有一天我看到晚报上有个话题让读者参与讨论。我觉得可以试试，于是连夜写了篇稿子给编辑发了过去。过了半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写的文章，不禁为自己点了个赞，同时鼓励自己道：我还是可以写写的嘛。就这样，我开始了投稿的历程。有时候，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突然灵感闪现，我会意识到如果把刚才的那一幕写出来的话，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于是，当夜我就写好稿子发给晚报的编辑。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带儿子去城隍庙感受过年的气氛。刚走出地铁车站，就看见便衣警察抓小偷的场景。趁热打铁，我跟儿子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回家后，我马上把事情发生的过程和自己的感想写了一篇稿子，随后发给了晚报编辑。几天后，稿子刊登了出来，题目是《致敬，人民卫士！》。七年来，我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稿子有二十多篇。

网络世界，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不过，我觉得，手里握着一张报纸，仔细阅读里面的每一个字，这个习惯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身体。即将到来的2022年元旦，是《新民晚报》复刊40周年的日子。我是《新民晚报》忠实的读者，我也会继续向它投稿，虽然我与编辑从未见过面，但正如古人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秋水·胡杨 方忠麟 摄

# 黄浦江的早晨

李富胜

天刚蒙蒙亮，我就踏上了黄浦江岸的大堤。凉爽的晨风拂面而来，心胸豁然开朗，我细细环视着身边美景，品享着黄浦江早晨的风情。

守了一夜的霓虹，在朦胧的晨光里仍然闪烁着迷人的光影。对面林立的摩天大楼，依然有写字间灯火通明。上海中心大厦“鹤立鸡群”，昂首挺胸刺向天宇。东方明珠是上海的文化地标，每次登上去极目远眺都非常震撼，如今站在堤岸再看它，却又有着不同的感觉。清晨的江边是宁静的，东方明珠却是如此灵透跃动。岸边的路灯仍然在闪闪发光，像两排整齐划一的卫士，守卫着夜上海，又像是一支雄壮的仪仗队，在迎接清晨和人们的到来。

朦胧中前方有绿色的光亮，一闪一闪慢慢向我靠近，原来是环卫工人开着清扫车在忙碌着。又有环卫工人臂上戴着红袖章，行走于堤岸上，仔细观察每一个角落，捡拾地上的垃圾，那样细致认真，像一个熟练的绣工在绣花似的。

东方泛起鱼肚白，渐渐变为浅橙色，又慢慢变成淡淡的红，晨曦终于露出“笑脸”，在蓝天下显得那么娇媚，黄浦江乃至整个城市瞬间亮堂起来，那些模糊朦胧的画面，越来越清晰，呼啦一下闯进眼里，让人目不暇接。江面上航船点点，越来越多。每条航船都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挂在桅杆上，在晨风中飘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堤岸上晨练的人也多了起来，各种运动各领风骚：打太极者，一招一式不紧不慢，柔中带刚；跳绳的，疾风暴雨般跃动；舞剑者，手握长剑，左右挥舞，剑穗随之甩动；长跑者，一身短打，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一曲悠扬的乐曲随着晨风飘然而至，寻声望去，一群舞者身着鲜艳夺目的服装翩翩起舞，潇洒倜傥。有几位风筝高手，把风筝送上蓝天。其中一个风筝吸引了我的注意，红绿相间，两个翅膀上闪着的彩灯组合成“OK”字样。放风筝的是一个老外，蓝色眼睛专注地望着天空，手中不停抖动着绳线，小心地移动着小碎步，那聚精会神的样子，真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好一幅晨练的动人画面！

“当当当……”海关大楼上的钟声响了，抬头望去，时针垂直指向六点整，这宏亮的钟声，敲碎了漫漫长夜，唤醒了这座城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旅游

# 忆昔老挝游

赵卿峰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对接的重要项目——中老铁路，近日在中老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全长1035公里，北起云南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从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将由2天缩短至3小时，到昆明有望朝发夕至。这让我回想起2015年赴老挝的那趟深度游。

老挝是我们的近邻，但对多数国人来说，比较陌生。当时我去老挝旅行，首站便是首都万象。说到万象，其实与大象并没有直接关系。它的含义是“檀木之城”。我在万象街上，确实看到了许多檀树。

在老挝国家主席府门前有一条宽敞笔直的澜沧大道，与老挝的标志性建筑凯旋门遥遥相对。这座凯旋门诞生于1969年，被作为老挝的抗战纪念碑。1975年老挝解放时，广大群众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从这里通过，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而将其称为凯旋门。在游览时，我了解到，2004年东盟首脑会议在万象召开，中国政府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帮助老挝重新修缮了凯旋门、修建了占地4万平方米的凯旋门公园和一个音乐喷泉。在凯旋门广场中央有一块黑色大理石铺面的卧碑，上刻老、中、英三种文字“中国政府和人民赠送给老挝政府和人民的礼物”。

走到凯旋门里，我抬头看了顶上的檐壁装饰，精美的佛教雕刻展示了老挝传统艺术的精华。拾级而上，几个楼面是小商品市场，琳琅满目。登上楼顶放眼万象的市容，澜沧大道如同一条“垂直的跑道”。旅友则把澜沧大道笑称为东方的“香榭丽舍大道”。

老挝的另一大标志性景点是被视为国宝的塔銮。塔銮是老挝最宏伟的寺庙，建于1556年，是历代皇室及高僧存放骨灰的所在地，传说里面还存放有释迦牟尼的胸骨。老挝国徽中的图腾，即为塔銮。塔銮建筑由一个主塔和30个小塔组成。塔基是3层，四面各建一座膜拜亭；中层建有30个小塔，像卫星一样环绕在主塔的周围；台座四周是24瓣大型莲瓣饰物。主塔的下部也是3层，为正方形，上部为圆形，塔尖是锥形，高耸入云，直插云霄。主塔顶部镀金，在阳光照射下，金光闪闪，光辉夺目。每年的佛历十二月（公历十一月），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传统宗教节日——塔銮节。

游万象不能不去香昆寺。该寺和玉佛寺、施沙格寺一样，都是老挝寺庙中的翘楚。香昆寺人称“佛像公园”，虽然叫寺庙，但是更像一个开放式的雕塑公园，各式佛像、神像雕塑，千姿百态，荒诞怪异。

环游老挝，我还去了万荣和琅勃拉邦两座城市。在当地我没有见到高楼大厦，所见的楼房没有超过六层楼高的。多数的楼房都十分“低调”地躲在椰树下或棕榈树后面。在老挝见了最多的还是寺庙、佛塔、佛像，这里的佛像也很特别，显得古朴、优雅、纯净、笑容可掬，与人有种格外的亲近感。

七夕会

# 癞痢头

刘友杰

老家是长江边上一座古老的小城。有石板条铺成的一条条狭窄又长的巷子，有大街上摆地摊、拉洋片的小生意人，旧中国留下的创伤时常会有见。

脱下开裆裤的我，依稀记点事了。在一群抓沙子、捏泥巴的小玩伴里，有一个小伙伴很显眼，大伙儿都喊他的绰号，“癞痢头”。至今“癞痢头”的模样早已模糊，可他头上的那个“癞痢”，一想起来还很恶心。

他的头发稀少，稀少的毛发又被剪子咬成了平丘。平丘上是东一坨西一片的不毛之地，涂着混和了脓或血的黑药膏，稍稍靠得近一点就能闻到一股不舒服的味。疼不？痒不？他好像不当回事。我们这些成天野在一起的小伙伴们，也都没当作大事，照例天天从一条巷子窜到另一条里，再不就到大街上钻来钻去。只有被外婆碰上了才会一把从中扯开，头也不转拉起我就往家里走。边走还边发着狠地说，小作孽的呀，要传染上的，你是不是也想当“癞痢头”？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过去在我国儿童里常见的头癣病，主要是直接或间接接触患者或患病的动物而传染的。以前剃头，都是在街边喊来的剃头挑子，一不小心，让头皮被剃头推子尖尖刺伤，就容易被感染了。大人们抵抗力较强，儿童们较弱，所以“癞痢头”多见于儿童。但大人也会有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一头“癞头疮”。

想起2005年秋，上午从上海飞广州，经过某处江南时，只见舷窗下绿葱葱大地上也有东一坨西一片白斑，在强烈西射下的阳光里，分外刺目。定睛细看，噢，那是被人削去了半个山峰的丘陵。大约是过去曾开过石料厂，或是在向山林要田中留下的伤疤。脑海中即刻浮现了小时候“癞痢头”的样子……

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在想，头上长了癞痢不容易医治，然而让大地上不去长“癞痢”，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